

大国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与 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研究*

肖翔¹, 武力²

(1.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关键词] 大国; 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 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下, 新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优先重工业发展阶段”、“产业均衡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重启阶段”。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 经济发展方式在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 并且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将发生深刻变化。当 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6 800 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 依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成本增大、效益降低等挑战, 已经难以维系。未来既需要克服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的不利因素, 又应当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 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5)01-0005-0011

关于如何定义大国的概念, 学术界还在探索中。综合当前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几个方面来界定大国的概念。从人口来看, 库兹涅茨将 1 000 万人口以上的国家视为大国, 钱纳里将 5 000 万人口以上的国家视为大国。^[1]也有学者认为, 人口在 1 亿人以上才能算做大国。^[2]从国土面积来看, 一般认为 100 万平方公里以上, 耕地在 1 100 万公顷以上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大国。^{[3](P6)}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 大国意味着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可以看做是大国的典型标志。还有学者认为, 大国概念还应该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 GDP 总量, 据此韩国、波兰、西班牙也可以进

入大国之列。^[4]此外, 矿产储量潜在价值、国内市场规模也被认为是衡量大国的重要指标。^{[5](P41)}我们认为, 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 中国都是一个大国, 并且在大国中排名前列。本文拟从大国的视角, 来分析新中国产业结构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及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大国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经济赶超过过程中产业结构大致经历了“优先重工业发展阶段”、“产业均衡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重启阶段”。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发生了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工业化中的大国因素研究”(项目号: 13CJL009)、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项目号: 14ZD007)、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课题“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新趋势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4-08-20

[作者简介] 肖翔, 中央财经大学讲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化,未来完成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是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在60多年的经济变迁中,虽然在经济体制方面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转变;发展水平方面经历了从贫困国家向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转变,但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国情影响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既具有世界大国的共性,还具有以下一些自身的特点:

其一,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3年人口就达6亿以上,2011年人口达13.4亿,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远在经济学家定义的大国标准之上。一方面,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潜在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始终是中国工业化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从人口比重看,虽然汉族占到90%以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汉族占91.51%),^[6]但从地域分布看,少数民族不仅分布较广,绝大部分的县都有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居住;而且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占了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中国作为有着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良性互动成为新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三,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从面积上来看,960万平方公里横跨六大温度带,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3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83%的水资源集中在占全国耕地38%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而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42%,水资源却仅占9%;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部,石油和煤炭的75%以上分布在长江以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中在东部。^[7]而且中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据有关学者计算,2005年,西部地区工业指数为25(全国为50,东部为78),尚处于工业化初

期的后半阶段。^{[8](P97)}

其四,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其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大国经济崛起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1952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4%、15.9%、0.33%、2.9%。^{[8](P67)}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80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2011)则达41095美元。^[9]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

其六,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资源总量巨大,1990年,中国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位居世界第三。^{[5](P41)}但是中国人均资源匮乏,中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水资源占世界的7%,森林面积占世界的3.3%,石油占世界的2.3%,天然气占世界的1.2%,煤炭占世界的11%。^[10]人均资源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担负大国崛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始终未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赶超与产业结构跨越发展。

其八,在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中,为构建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建立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占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实现大国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也影响着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述大国特征影响着新中国60多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经济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未能考察大国国情对产业结构与经

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影响,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释能力有限。我们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出发,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对未来二者的变革进行展望。

二、1949—1978: 优先发展重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成为发展的“瓶颈”。工农结构中工业仅仅占30%,其中,现代工业仅占16%左右,同时工业内部轻工业又占到73%以上^①。主要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美国钢铁产量是中国的447.72倍,发电量是中国的80.26倍,甚至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P329)}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符,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较大的压力。苏联模式在当时的示范效应以及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局势,更让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迫切要求建立起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一百多年来的战乱和被侵略历史,使得社会财富消耗殆尽。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技术水平要求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实现工业化赶超,首先需要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以跨越“贫困性陷阱”。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需要打破需求方“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与供给方“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纳克斯,1953)两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同时,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和经济封锁政策,使新中国很难发挥比较优势,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阵营

中的苏联也属于短缺经济并且援助重点在东欧,很难给中国大规模的资金援助。

上述外部条件决定中国不可能选择依靠外援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国政府只能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充分挖掘大国优势,独立自主地发展重工业。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政府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和对公有制企业工资、利润、投资的高度控制,压低了城乡居民的消费,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实现。这些措施让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更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这个时期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2%;第二产业产值迅速上升,1952年仅占28.2%,1978年则上升到47.9%,其中,轻重工业比重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工业占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1978年的56.6%,^[12]奠定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从1952年的28.2%下降到1978年的21.6%,长期未能有效提高。^[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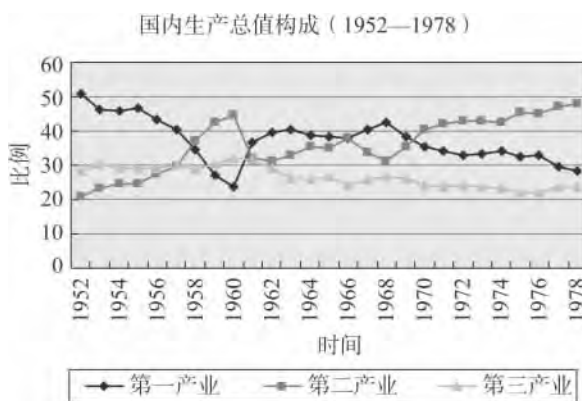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52—197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① 笔者根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电子版)的相关数据推算。

② 参见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一卷)》,第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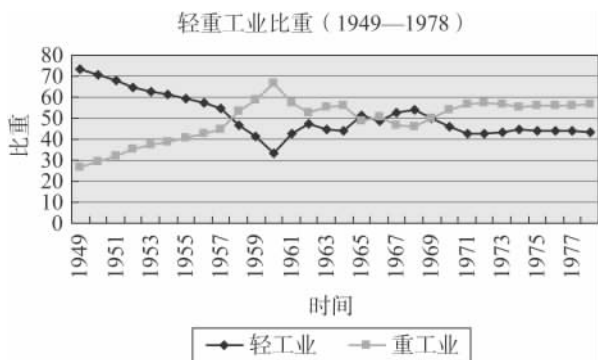


图2 轻重工业比重(1949—197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在1949—1978年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方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其一,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发挥大国优势,将资源直接配置到重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基建投资数据为例,“一五时期”投资于重工业的比重为36.1%，“二五时期”为54%；“三五时期”为51.1%；“四五时期”为49.6%。^{[14](P72)} 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大国优势,在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兴建、扩建了一汽、鞍钢、攀枝花等一大批重工业企业。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投资方向集中在内地。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106项民用工业和44项国防工业。民用项目有50项设在东北,31项设在中部,24项设在西部;44项国防企业有35项布置在中、西部地区^①。“三线建设”更将大规模投资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投资改善了内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利用了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但这一时期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发展相对缓慢。

其二,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实现优先重工业只能通过自身积累。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

业品的计划供应,以及严格的居民口粮标准和城镇职工工资管制,抑制居民消费,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于是,一方面是政府抑制下旺盛的消费需求,始终存在着“持币待购”现象;另一方面,重工业内部则形成内部供求关系的循环,即生产的产品又作为投资品用于扩大重工业的生产,于是就出现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旺盛,形成所谓的“短缺经济”,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紧运行状态。长期抑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使得轻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人力资源的投入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虽然中国人均资源有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为迅速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大规模投入资源,有的甚至不计成本。中国人口多的国情与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人海战术”成为当时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

其四,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下,中国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领域的突破,巩固了中国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政府还推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填补了工业空白,并探索出“鞍钢宪法”,希望调动广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以推动技术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科技人员长期受到政治歧视,科研单位、企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最终技术进步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其五,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经济运行效率损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进行讨论。从宏观经济来看,计划的不确定性、地方部门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决策层的信息缺失和滞后,常常使政府投资失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大跃进”就是极端的例子。而从微观经济来看,作为政府投资主要对象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既缺乏约束机制又缺乏激励机制,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效益难以提高。在这一时期由于压低消费以保证高积累,并没有实行各尽

① 笔者根据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15、416页资料计算得出。

所能、按劳分配政策,而是实行了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加上管理水平低,党和政府更多是采取精神激励和政治高压(运动)来克服低效率,但这些努力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解释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加剧的现象,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政治运动的极致。

总之,在优先重工业战略下,经过近30年的发展,虽然中国初步奠定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未能跨越贫困国家行列。带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1979—1997:产业均衡发展下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中国今后建设的十条方针,包括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15](P456)}它标志着我国从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为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

为了克服计划经济模式下管得过死的弊端,中国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的渐进式改革。1979—1997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GDP比重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农业比重下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随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问题。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

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16](P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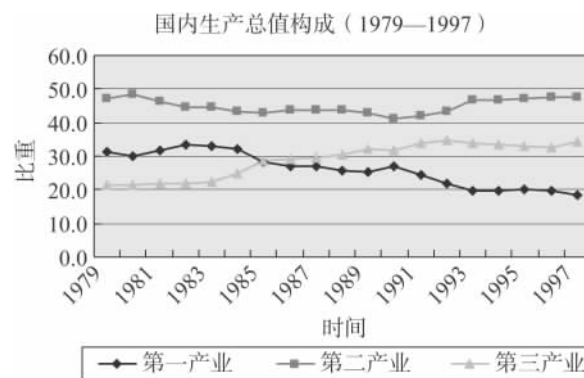


图3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79—199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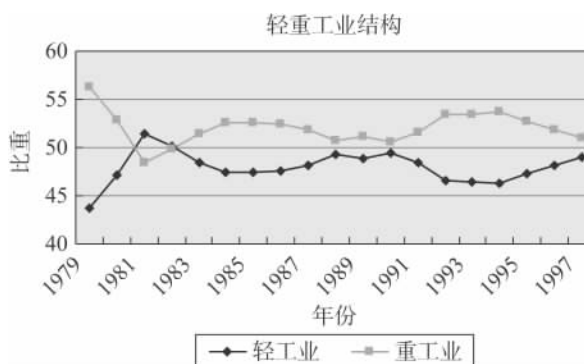


图4 轻重工业比重(1979—199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2(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如下特征:

其一,中国渐进改革,释放了大国改革的红利,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从物资配置体系、企业改革还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都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双轨制”中的“计划轨”保持了大国经济的稳定,保持了重工业等传统部门生产的稳定;“市场轨”则激活了经济效益,吸引资源向盈利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市场轨”又不断侵蚀“计划轨”,不仅提高了企业和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资本和劳动力由效益低部门向效益高部门转移。

因此,这个时期三次产业都获得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实质上更多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渐进式改革将改革成本成功地化解在大国的发展之中,比较妥善地处理好了大国的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避免了爆炸式改革带来的经济崩溃。

其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市场需求被逐步激活。由于是渐进式改革,计划与市场的作用是一个缓慢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直到1997年,一方面,企业“投资饥渴症”仍然存在,旺盛投资需求拉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日用品,轻工业有了较快增长,在居民消费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也大幅增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较大的国内市场,促进了产业均衡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为居民消费提高注入活力。产业结构发展和消费需求呈现良性互动的趋势。

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导致了政府压低资源品价格。大规模的资源投入与消耗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GDP(按照1995年美元计算),1980年为0.3美元、1996年为0.7美元。而日本分别为9.3美元、10.5美元;美国分别为2.7美元、3.4美元;巴西分别为4.7美元、4.4美元。^[17]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能耗效率偏低。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多,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大规模物质消耗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步增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弊端逐步凸显。

其四,1979—1997年外延和内涵共同发展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城镇人均收入1985年为农村的1.86倍;1994年则达到2.86倍;1997年也为2.46倍。基尼系数逐步拉大,农

村内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为1995年的0.34;城镇基尼系数从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18]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人均GDP来看,1979年四川是广东的70.5%,1997年则下降至40%以下。1979年贵州是广东的50%;1997年则下降至22.2%^①。收入差距的拉大与大国不均衡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矛盾逐步凸显。

四、1998—2012:重启重化工业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199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不足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加入WTO,推动中国出口与国际资本的吸纳;推进城市化进程,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形成等措施拉动内需。在这些措施的拉动下,中国重化工业重启。这一时期重化工业的重启,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原因完全不同,前者是要突破工业“瓶颈”;后者是因为内需不足,而重工业则可以实现内部循环,消化自己创造的供给。

从产业结构来看,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2%,2012年为45.3%,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36.2%,2012年为44.6%;第一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17.6%,2012年下降到了10.1%左右。^[19]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817.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71.5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日本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6%、20.95%。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人均GDP在839.39美元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0.8%。同为中等收入大国的巴西在人均收入

① 笔者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

5 795.2 美元时,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为 24.02%^①。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轻工业在 1998 年、1999 年不到 50%。2000 年以后中国工业统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业比重 2000 年为 39.8%,在同一口径内 2011 年

下降到 28.2%。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余的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参见表 1)。

表 1 高耗能行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 年 份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 全国工业总产值 |
|------------------|---------------|--------------|-----------|--------------|--------------|-------------|------------|
| 2003 | 6 235.26 | 9 244.86 | 5 653.25 | 10 007.37 | 3 564.07 | 6 858.6 | 142 271.22 |
| 2007 | 17 850.88 | 26 798.80 | 15 559.44 | 33 703.01 | 18 031.88 | 26 462.65 | 405 177.13 |
| 2010 | 29 238.79 | 47 920.02 | 32 057.26 | 51 833.58 | 28 119.02 | 40 550.83 | 698 590.54 |
| 2010 年比 2003 年增长 | 369% | 418% | 467% | 418% | 689% | 491% | 391% |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整理。

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如下新的变化:

其一,投资、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与重化工业重启的重要动力。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拉动了内需,也拉动了重化工业的需求。例如,国家 4 万亿投资中重点组成部分,基础设施、灾后重建、保障房等项目都和钢铁行业有关,据有关部门测算这些项目将拉动 2 亿吨粗钢。^[20]中国房地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住房投资 2009 年比 1998 年增加了 900% 以上,^[21]房地产的发展拉动了水泥、钢材等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从出口总额来看,1998 年我国出口额为 1 837.09 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为 1 632.20 亿美元。2012 年出口额达到 20 487.1 亿美元,工业出口总额达到 19 481.6 亿美元,分别上涨 1 015.2%、1 093.6%。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总值的比重 1998 年不到 89%,而到了 2012 年上升到了 95% 以上^②。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其二,物质资本消耗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中国政府压低要素价格,资源、能源与环境未能进入成本。大规模的物质消耗成为推

动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压低投入价格,使得我国要素价格未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例如,中国目前矿产补偿率平均仅为 1.18%,低于国际的 2%—8%。而石油、天然气的费率为 1%,远低于美国的 12.5% 和澳大利亚的 10%。^{[22](P206)}中国能耗也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2009 年,我国万美元国内产值消耗的标准油为 7.68 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2.97 吨,高收入国家为 1.81 吨,中等收入国家为 6.48 吨,均远低于我国消耗水平。人均资源匮乏的日本仅为 0.97 吨,人均资源相对丰富的美国也仅为 1.93 吨。^[23]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经济规模逐步增大,不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压力日益凸显、环境承载力日益脆弱,也带来了国际资源、能源与环境方面的紧张。

其三,中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虽然在 500 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 220 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 80%、数控机床和先进

① IMF 数据库,国泰君安数据库。

②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 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相关数据整理。

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24]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四,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发展呈现出大国“非均衡”增长的特征。2003年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8年高达0.484,2012年为0.474,^[25]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为57722元,中部为32427元,西部为31357元,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78%、84%。城乡差距仍在逐步拉大,1998年城市收入比农村高150%,但在2002年以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高200%以上^①。收入差距拉大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得到全社会的共享,同时也不利于大国内需的释放。

五、大国之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产业结构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双重赶超升级的特征。从世界工业化普遍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经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升级;而工业内部则表现出从轻工业充分发展之后,再向重工业的升级^②。中国的产业升级则表现出双重升级的特点,即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亟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推动了整个工业化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不同。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演变对中

国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局部热战让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中印、中苏边境摩擦更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紧张。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成为中国优先重工业发展时期的重点。“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助的“156”项中军事工业占将近1/3;“三线建设”更将战备推到了高潮。军事工业产品尤其是高端的军事技术,难以按照经济原则从国际市场中购买。这让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发挥大国优势,在高端军事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依旧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防建设,让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不断增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东西冷战结束,世界走向多极化,在大国竞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旧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宇航技术、核潜艇等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军事工业发展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作为支撑,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与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高端军事工业存在技术密集的特征,高端军事工业的发展又存在对技术密集的民用工业(包括重工业在内)强大的技术扩散。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

第三,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业地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优先重工业时期,中国就曾因农业供给紧张导致了国民经济陷入困境。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虽然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农业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的发展仍需要挖掘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确保大国的粮食安全。

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长期受到抑制,大批劳动力被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滞留在农村,甚

① 笔者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② 以上特征分为三次产业变动规律又被称为“库兹涅茨法则”,工业内部的结构变迁规律又被称为“霍夫曼定律”。参见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第158、159、160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至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逐步放开对城市私营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重启,在第二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业难困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五,资源和环境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源与环境成为制约中国的重要因素。从“一五计划”开始,资源、能源工业的发展一直是国家开发的重点。虽然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石油、煤矿、电力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资源、能源短缺日益凸显,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严重挑战,这就迫使中国产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

第六,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能源有限,中国制造业更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应当积极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推动企业走出去,延伸企业价值链,通过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启示

虽然中央政府从1995年就开始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一五”时期提出一系列“约束性”的指标;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但重化工业重启尤其是基础型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能完

成。中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虽然让中国成功摆脱了“贫困性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包括:(1)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面临成本^①不断上升的挑战。(2)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内需与外需都面临较大的挑战。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更让内需不足的问题严峻。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越南、孟加拉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业发展,分别从高端和低端挤压了中国的外需空间。人民币不断升值更让外需雪上加霜。(3)由于政府二次分配职能弱化,“强势资本、弱势劳工”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而且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极易产生腐败问题,社会矛盾凸显。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结合中国大国国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发挥大国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产业结构存在的双重升级主要是农业向工业升级、工业内部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升级,这种升级模式构建了我国完备工业体系,推动了中国高速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中国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二是第二产业内部由基础型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升级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变。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而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应当加大发展力度。中国服务业目前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未来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内涵性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内部升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应当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由于目前中国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能源、资源、环境紧张,原有的高投入、物质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中国政府应当发挥政治动员力的优势,压缩产能过剩,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

^① 成本主要包括能源、资源、劳动力、环境承载力等方面。

进行调整,促使中国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大国改革红利。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通过改革迅速激活劳动者、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但是当前市场仍不完善,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制经济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历史上政府发挥大国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经过战略调整国有企业集中在控制国家命脉的行业,拥有强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经营效率始终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难题。民营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初具规模,而且运行灵活,市场经营能力较强。但是,技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风险很高,单纯依靠民营企业难以胜任。这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建立混合制经济,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实现大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延伸中国的价值链。(2)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中国政府的低价工业化重点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控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外延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能源的过度耗竭,环境破坏。通过价格改革,让市场反映上游产品稀缺程度,将环境纳入生产成本,成为转变经济方式的重要手段。(3)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转变政府职能不仅需要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干预,还需要重新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进行调整。虽然90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政府逐步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在21世纪之初进行了科学发展观的探索。但是,由于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仍未进行根本性的变化,替代GDP的考核指标制定难度较大,如绿色GDP就一直未能推出。在多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注重“GDP”这一重要指标。目前财税体系、土地出让金制度也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推动大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的上马,这些都构成了对重化工业强劲的拉动力。未来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财税体系进行调整,破除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地方

官员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激励。

第三,发挥大国人力资本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但可以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挖掘我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低成本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延伸产业价值链。而如何激活中国科技进步的活力,在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仍然是未来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挖掘大国消费需求。中国是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需求潜力,但由于在过去发展中注重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推进,压低了劳动报酬,也使得财富分配出现不均,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提升。未来我们应当一方面注重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推动咨询、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工业部门存在“强势资本、弱势劳工”的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着手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未来城镇化应该以内涵增长为主,向重视质量提高的集约式发展转变,走智能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道路。

中国的基本国情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如何立足国情,发挥大国有利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促成发展方式转变,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 [1] 欧阳峤.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J]. 经济学动态, 2012, (12).
- [2] 张季节. 大国优势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J]. 现代经济, 2007, (6).
- [3] 陈佳贵. 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 [4] 顾海兵. 大国与大国经济发展战略[J]. 太平洋学报, 2005, (1).
- [5] 欧阳峤. 大国综合优势[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 [6]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91.51% [Z]. <http://news.xinhuanet.com/>

- politics/2011-04/28/c_121357862.htm.
- [7] 梁进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瓶颈与环境约束[J]. 经济研究参考, 2011, (1).
- [8] 武力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9] 国家统计局. 国际统计年鉴(2012)(电子版)[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10] 金碚. 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11] 毛泽东文集[M]. 第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国家统计局. 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49—1984)(电子版).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 [13]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电子版).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 [1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编. 国民收入统计汇编(1949—1985)[C].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 [15] 刘国光主编.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6] 武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 [17] 国家统计局. 2000 国际统计年鉴(电子版)[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 [18] 李实.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 (4).
- [19]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3(电子版)[Z]. 北京: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 [20] 陈瑜. 中国钢铁行业 2009 年下半年有望转暖[J]. 重型机械, 2009, (2).
- [21] 武力, 肖翔. 中国当代城市房地产的变革与发展[J]. 河北学刊, 2010, (5).
- [22] 张卓元改革论集[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 [23] 国家统计局. 主要国家(地区)年度数据库[Z].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gjnd>
- [24] 黄海洋.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政策的策略选择[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2, (9).
- [25] 统计局. 2012 年基尼系数为 0.474[Z]. <http://gh.cri.cn/27824/2013/01/18/3365s3995580.htm>.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Big Powers

Xiao Xiang¹, Wu Li²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2.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Key words] big power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new China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witnessed “the stage of heavy industry priority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balanc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age of heavy industry restart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mode,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ost increase, benefit reduction and more difficulties to susta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need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shortage of per capita resources, fragile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should give full play of the advantages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als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责任编辑 李文苓]